

# 《晏子春秋》与中国古代伦理秩序

刘晓川

《晏子春秋》是记录春秋后期齐国贤臣晏婴言行事迹的专著。晏婴仕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长达五十余年，促使齐国在诸侯纷争的年代仍然长期处于相对兴盛的地位。《晏子春秋》所著内容集中彰显了晏婴尽礼行忠、以民为本、为政以德、躬行节俭的家国情怀。

## 尽忠职守 尽忠国家

“礼”是古代社会“五常”伦理价值规范之一，是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法则，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规范。晏婴认为，人之所以高贵，就是因为有礼，因为守礼实现了家庭、社会中的长幼有序、父子有别、上下分明。晏婴特别推崇周礼，强调要以礼治国，用礼来规范伦理秩序。他认为，在礼的规范中，大夫的施恩不应普及全国，民众不懈怠，财货不转移，工商不改行，士人不虚浮，官吏不僭越，大夫不收取公室之利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，有一次，齐景公想与晏婴免除礼节来欢畅共饮，但晏婴认为，“礼”对朝廷秩序有着约束作用，如果大夫不讲“礼”，下面的官员就会效仿而变得不恭敬，因而也就无法做到尽忠职守、尽忠国家。

由此可见，作为一名臣子，晏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“尽礼行忠”的忠臣。对此，晏婴曾曰：“故忠臣也者，能纳善于君，不能与君陷于难。”即忠臣就是能给君主进献良言善策，不能和君王一起陷于危难。《晏子春秋》所论述的“忠”，不局限于忠于君主，更多地表达了忠于国家、社稷的思想意涵。那么，忠臣之行应该是怎样的呢？对此，晏婴认为，忠臣应该直言进谏，选拔贤人而用之，衡量自己的德行从而担任适当的官职，并获

取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俸禄，看到贤于自己的人要学会让贤，不以官位高低作为自己待人的准则，也不以官位高低作为尽忠的标准，对待下属不苛刻，对待上级不阿谀奉承。

## 以民为本 爱民乐民

民，事之本也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的立论基础，其核心要义是重视百姓疾苦，并做到爱民之所爱、乐民之所乐。为政者只有恪守以民为本的理念，注重维护百姓利益，处理好官与民、权与民的关系，才不会失去人格道义，才能维护国家稳定。早在西周时期，统治者就提出了利民为本的治国思想。《晏子春秋》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大量论述，包含了晏婴对官民、权民关系的深切思考。

晏婴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晚期，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发展和宗法关系的减弱，以及外部压力的减轻，致使对各国君主和官吏权力的约束监督相对减弱，进而造成各国君主和贵族苛责于民、劳役百姓。对此，晋国大夫叔向曾向晏婴请教为政者的治国思想和行为问题。晏婴回答说，最高尚的思想是爱护百姓，最淳厚的行为是使百姓快乐，最卑下的思想是苛刻待民；地位卑下而不失去尊贵的德行，委曲求全而不失去正直的品格，“以民为本也”。

作为齐国重臣，晏婴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以民为本、爱民乐民的核心理念，而且在实践中处处彰显着惠民、利民、养民的政治操行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，有一次，齐景公为了扩大晏婴的住宅条件，借晏婴出使鲁国之际，把晏婴邻居的住宅拆了。晏婴得知后说，为了扩大自己的住宅而侵犯邻居的利益，违背民心。晏婴坚决不居住，并恢复邻居原来的住宅，奉守不损害百姓利益的准则。

以民为本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百姓的物质需求——粮食，这在农耕时代尤其如此。而要满足百姓的粮食需要，关键在于保障不误农时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，在农收时节，齐景公为追求逸乐，役使大批民工兴建长廊台。有一次恰逢齐景公举办大型饮宴，晏婴虽在旁边陪侍，但心里始终牵挂着无法回家收获的民工。当酒过三巡时，晏婴离开席位，边舞边唱道：庄稼结穗而不能收获，秋风吹来全部凋落，风吹雨打全部飘散，上天无情，不让民活。晏婴唱完，潸然泪下。酒酣耳熟的齐景公明白了晏婴的深意，于是下令停止工程，民工得以回家收粮。

## 廉洁清正 为政以德

廉者，政之本也。官德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要求和道德规范，体现了为官者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和慎独的自律极致，与治世安邦息息相关。《晏子春秋》所蕴含的廉洁清正、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以以德治吏、良吏治国为主线。

那么，到底什么是官德呢？齐景公与晏婴关于社稷之臣、善为国家等问答，折射出晏婴对这一问题的独到思考。齐景公问晏子，对于国君而言需要什么样的臣子？晏婴答曰：所谓国家大臣，就是能够稳固国家，分清君臣上下之礼。齐景公又问，如何发现治国的贤人名士呢？晏婴答曰：评判贤人名士，要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作出评价，而不是根据华丽的言辞作出判断。

晏婴在为官期间，始终以廉洁清正为本，心怀清正廉洁之心，坚守道德情操，不随波逐流，是讲官德、重官德、守官德的楷模。齐国相国庆封

由于专权遭到众大夫的攻击而逃亡，人们瓜分他的财产并提议把卿殿分给晏婴作食邑。晏婴坚决不接受，认为人人都想生活优裕，但对财富既不能废弃减损，也不能任意无度。在他告老还乡时，主动提出要把封邑还给齐景公，齐景公认为这没有先例，不同意晏子的提议。晏婴说，品德厚重而接受俸禄，是为了体现主上的圣明；品德微薄而退还俸禄，是为了使臣下廉洁。在晏婴看来，自己年老德薄主动把封邑退还给齐景公，这是他廉洁清正的表现。

## 俭以养德 躬行节俭

齐国建国之初，特别是到齐桓公时期，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改革举措，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。然而，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，齐国的奢靡腐化之风也开始盛行，到齐景公时期尤为如此。《晏子春秋》不仅多处论述了齐景公嗜酒崇乐、华衣美食、大兴土木的奢靡生活，而且贯穿着晏婴以俭以养德的清醒认识。

晏婴认为，只有君主约束自己、节俭为政，才能减轻百姓负担，赢得民心。面对齐景公奢为宫室、广为台榭、丰乐侈游与百姓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形成的鲜明对比，晏婴极力劝谏齐景公厉行节俭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，齐景公问晏婴：我想穿上圣贤之王的服饰，居住圣贤之王的房子，这样各国诸侯会来归附吗？晏婴答道：效法他们的节俭是可以的，如果只是效法他们的服饰房子，就没什么好处。齐景公又问晏婴，作为君王，身份尊贵百姓安定，这样困难呢，还是容易？晏婴回答说，作为君王，节制自己日常的开支，其余的用以照顾百姓，这样就自身尊贵而且百姓安定。

晏婴在劝谏齐景公的同时，更是身体力行、躬行一生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，作为相国，晏婴吃的是粗粮淡饭，菜肴也比较简单平常，连齐景公都感到过意不去。晏婴却不以为意，觉得不仅能吃饱肚子，还能有荤菜、素菜的搭配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一再婉拒齐景公赐予的封邑、千金、狐裘、宅第、市租、乘马等，成为百官表率。

(转自《学习时报》)

# 三纸无驴

刘琪瑞

南北朝时期的学者颜之推撰写的《颜氏家训》是中国家训史上的重要著作，里面谈了很多教人读书写文章的道理。其中《勉学》篇有这样一句：“邺下谚曰：博士买驴，书券三纸，未有驴字。”说的是邺城这地方，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，要到集市上去买驴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，得立下契约才行。付完钱后，博士要求卖驴人写一份契约，卖驴人不识字，请博士代写。他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纸，都没提到应该写的“驴”字。卖驴人等得不耐烦，轻蔑地说：“你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，我卖了一头驴子给你，收你多少钱，不就完了？干吗还没完没了写了整整三张纸？”围观的人哄笑不已，博士也自觉没趣，忙牵着毛驴灰溜溜地走了。颜之推举这个例子，是

希望自己的后代不要效仿当时流行的文风，“问一言辄酬数百，择其指归，或无要会”，“使汝以为师，令人气塞”。

北宋初年有一个叫赵邻几的文臣，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、直史馆、知制诰等职。他自幼好学，知识渊博，善写文章，每次构思，必正襟危坐，一下笔就数千言。他写的文章对仗工整，结构缜密，受同辈人推崇。他曾作《禹别九州赋》，长万余言，时人争相传诵。但这位文章老手，在担任为朝廷起草文书的知制诰时，却表现不佳，《宋史》说他“及掌诰命，颇繁富冗长，不达体要，无称职之誉”。赵邻几写的公文，篇幅冗长，文辞累赘，不符合文体要求，是个不称职的秘书，他把写赋的才能运用到写公文上，写赋要求铺张扬厉，而公文要求简明准确。

明代一位叫茹太素的官员，也犯了与赵邻几同样的错误，他的遭遇就更加曲折了。明代天启年间官修的《礼部志稿》中，记载的一则掌故颇为有趣：明代洪武年间担任刑部主事的茹太素，每次上奏章动辄七八千字乃至万言，且语意艰涩，明太祖朱元璋每看他的奏章都头疼。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，足足有17000字，因为篇幅太长，朱元璋懒得看他的奏章，让别人念给他听，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。朱元璋大怒，令人将茹太素杖打了一顿，随即下令：“虚词失实，巧文乱真，朕甚厌之，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，罪之。”

第二天，朱元璋又想起茹太素的奏折，耐着性子听完了余下的部分，认为奏折最后提出的五条建议还是不

错的，朱元璋采纳了其中四条。明五百字就能把问题说清，茹太素非要洋洋万言，误时误事。有鉴于此，朱元璋大力革新文风，命令中书省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发给官员，“俾陈得失者无繁文”。

赵邻几、茹太素都是文采不俗之人，所以下笔千言对他们不是难事，但不分场合地炫耀文采、炮制长文，则体现出他们缺乏文体意识。不同的场合要使用不同的文体，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规范，古人对此十分讲究，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已出现了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”的说法，后来对文体的辨别更加明晰。写文章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，宜简明平实，直击要害，若是千言万语才进入正题，早已错过解决实际问题的时机了。

(转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